

汉语文化研究

张绍滔 著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汉语文化研究的对象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汉语文化研究	(9)
第三节 汉语文化研究的方法	(23)
第四节 汉语文化研究的意义	(31)
第二章 语词文化	(39)
第一节 语词本义的文化遗迹	(40)
第二节 词义引申的文化制约	(53)
第三节 不等值词语的文化特色	(62)
第四节 熟语的文化特性	(71)
第五节 词汇新发展所反映的社会文化	(81)
第三章 汉字文化	(92)
第一节 汉字与汉民族文化	(92)
第二节 汉字以形表义方法的思维特征	(100)
第三节 汉字形声化发展趋势的文化意义	(111)
第四节 汉字评价的文化思考	(121)
第四章 语法文化	(127)
第一节 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	(127)
第二节 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	(135)
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	(145)

第四节	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	(155)
第五章	语用文化 ·····	(164)
第一节	说话规则的文化阐释·····	(164)
第二节	语用预设的文化因素·····	(176)
第三节	会话含义的文化特征·····	(187)
第四节	言语行为的文化规约·····	(199)
第五节	社交指示语的语用文化信息·····	(211)
第六章	修辞文化 ·····	(223)
第一节	修辞原则的文化涵义·····	(223)
第二节	选词炼句的文化意识·····	(234)
第三节	辞格的文化依据·····	(244)
第四节	篇章修辞的文化特色·····	(255)
第五节	语言风格的文化心理·····	(270)
第六节	语体的文化制约·····	(283)
第七章	汉语文化研究在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	(297)
第一节	汉语母语教学的文化因素·····	(297)
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因素·····	(309)
第三节	海外华文教学的文化因素·····	(323)
第八章	结语 ·····	(33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汉语文化研究的对象

一、语言 and 文化的定义

语言和文化各有多种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定义体现了不同的认识角度、研究目的,也表现了不同的研究范围。为了明确汉语文化研究的对象,必须首先交代我们所规定的语言和文化的定义。

(一)语言

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言指人类用来交际的所有符号系统,它不但包括一般所说的语言,还包括作用于听觉、视觉和触觉的各类符号——副语言。在文化研究中所使用的语言概念经常是广义的,尤其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狭义的语言一般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最狭义的语言还不包括文字,因为文字仅仅是记录语言的一种符号。

本书采用的语言概念是狭义的,而且只指一种具体语言——汉语。我们在使用语言概念时原则上不联带汉字。由于汉语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汉字有着相互影响的特殊关系,也由于

本书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的写作目的,所以在讲述语词的文化涵义之后独辟一章专论汉字文化。

(二)文化

文化的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 E·B·泰勒在《原始文化:对神话、哲学、宗教、艺术和风俗的发展的研究》(1871年)一书中提出的。从那以后,争论颇多,据说现在有 167 个不同定义。本书所说的文化涉及的范围比较宽,指人类生活方式的种种情形。当然,这些情形不是零散无组织的。它们由下面三个子系统组成一个文化大系统:

1、物质文化子系统

所谓物质文化,指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具体产品,如人类生产工具、衣食住行的器物和行为等。物质文化是直观可见的,它是文化大系统的基础,是另外两个子系统的前提条件。

2、制度文化子系统

制度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它指各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礼仪宗教以及有关制度的种种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具体情况,它不是直观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形迹可寻的。在文化大系统中,它是非常关键的层面,是另外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保证。

3、心理文化子系统

所谓心理文化是指人们的思维方式、信念情趣、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等。心理文化在文化大系统中处于深层次。它是隐性不可见的,但稳定性更强。它对人们“产生的许多影响都被埋入大脑深层的原初部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我们的意识层面之下”,“使我们

在下意识之中受其限制而趋于特定的行为”。^①

以酒为例,汉民族酿酒的工具、工艺过程、技术技能及其产品(各式各样的酒),是酒的物质文化;汉民族在酿酒过程中的人力组织方式,酒在汉民族生活中的地位、汉民族喝酒和对朋友劝酒的方式等,是酒的制度文化;汉民族对酒的信念、价值和心理观念,是酒的心理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都能在语言中被积淀下来,但是由于它们有其各自的特色,它们在语言的各组成要素中,在言语的各个不同阶段,被积淀的情形往往不一样,所发挥的作用也大不相同。

汉语和汉民族文化都各有它们自己漫长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汉语和汉民族文化各有不同的形态特点。本书的研究以现代汉语为主,在必要时也会兼顾到古代汉语。研究讨论现代汉语语言系统及现代汉语使用过程中的汉民族文化蕴含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二、汉语文化研究的视角

语言和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又不相等同,构成了异常复杂的关系,概而言之有二:其一,语言是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其二,语言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和文化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渗透。两者之中,文化制约、影响着语言,语言又反作用于文化。这种作用和反作用现象给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角度。

语言和文化相互渗透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以语言现象为研究材料,重点在于利用语言和文化的贯通,以语言的研究

^①拉里·A·萨姆等《跨文化传通》第29页,陈南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结论为论据来论证、解释文化现象,这是文化研究中的语言视角。例如,中国学者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通过大陆的方言现象分析来论证民族迁移等文化现象。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鲍阿斯的《种族、语言与文化》通过印第安语的调查研究来探寻这些民族的文化表现及其规律,鲍阿斯本人掌握印第安语的十七种方言,他是一个语言专家,但是他的研究却属于文化学范畴。另一种是从文化现象的研究入手,重点在于用文化结论来论证、解释语言现象,这是语言研究中的文化视角,属于语言学的范畴。陈建民的《语言的社会文化新探》、申小龙的《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中国句型结构》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重要专著。

本书的汉语文化研究属于后一种类型,它通过对汉语语言系统所蕴含的和言语系统所体现的汉民族文化的探寻和研究,来解释汉语本身及其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加深对汉语本质特征的认识。也就是说,它是以文化为视角来探讨汉语和汉语使用规律的。

三、汉语文化研究对象的特点

汉语文化研究汉语与汉民族文化的关系,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学科。汉语文化研究的对象,既是语言的,又是文化的,是语言和文化相互贯通的部分。语言文化研究的对象具有以下特点:

(一)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性

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性指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以及语言对文化的影响。试以词语“筷子”的产生演变经过来说明文化对语言的渗透情况。

汉人吃饭用筷子,所以有“筷子”这个词。是汉民族饮食的习惯方式才产生了语词“筷子”。中国上古时吃饭用手抓,吃肉的辅助工具是匕、叉等,当时没有筷子,也就没有“筷子”这个词。《史记·十

二诸侯年表》：“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可以说，最迟到商纣时，用筷子吃饭已经很普遍，不过那时叫“箸”。据说因为“民间俗讳……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①这才演变为现在的“筷子”。从“箸”到“筷子”的词语演变经过，可以看到民族的物质文化产生了相应的词语，民族的心理和习俗促使语言因素发展演变。

语言和文化的渗透性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有文化对语言的渗透，也有语言对文化的渗透，就一个具体的语言文化现象来说，有时候却很难分出究竟是文化影响了语言，还是语言影响了文化。本书利用语言和文化的这种渗透性分析汉语要素中所包涵的文化因素，分析汉语使用过程所包涵的文化规则，这些与汉语和汉语使用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现象为我们认识汉语的本质，揭示汉语使用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同时也在语言这个特定的范围内让我们看到了汉民族文化的实质和特点，以及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语言的文化相对性

一个语言形式的本身并不必然包含意义，语言意义是语言形式激活使用者大脑中贮存的经验而表现出来的。如果使用者因为文化系统的差异在大脑中贮存的经验不同，那么同一个语言形式，在两个不同的使用者中便有其不同的意义。文化经验是各种经验的核心部分。因此，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不单纯决定于语言能力，同时也决定于使用者自身的文化经验。这里所说的语言的文化相对性，指的就是文化经验对语言进行解释的能力。例如：

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上面堆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

^①陆容《菽园杂记》卷一。

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花椅袱，黛玉便向椅子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让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下。（《红楼梦·三回》）

这是林黛玉刚到荣国府拜见二舅父贾政的情形。作者十分详细交代一个一个的座位，又述说林黛玉十分谨慎地选择座位。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座次包涵着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在讲究礼仪的旧中国，居家正房内，正面靠东壁面西是上首座次，位最尊；靠西边面东是下首座次，位略次。王夫人把黛玉往东让，不但因为她是贾母心肝宝贝，而且出于舅母对第一次来家作客的外甥女的客气。林黛玉选坐挨炕椅子是谨守晚辈的礼规，不敢越礼；她只是在王夫人一再坚持下，才上炕挨王夫人坐下。这样处置，不违礼又表现出亲情，举止恰到好处。可见，位次不单纯是个空间位置的次序问题，在特定的文化情景中，它同时也是特定的制度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对具备这种文化经验的人来说，位次才有这些文化意义；对不具备这种文化经验的人来说，位次就不具备上述文化意义。现代的中国初中生，年龄与林黛玉相仿，但他们便弄不明白林黛玉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劲选一个座位。文化意义不是语言形式的规约意义，同样的语言形式对不具备相应文化经验的人，便不传达文化意义。所以说，语言与文化相交合的这个部分，语言中的文化蕴含并不必然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地表现其意义。有的人能够自觉感受到它的存在；有的人则是隐隐约约地有这样的感觉；有的人却看不到它的存在。语言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探寻它们的存在，揭示它们存在的方式和规律。

（三）语言中文化的多样性

一种语言所反映和表现的当然是与母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民族文化，与此同时，他民族的文化通过文化传播和接触，也往往会在本民族语言中留下影响的痕迹。例如，佛教原为印度的一种宗

教文化,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对汉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历代佛经翻译家的介绍,汉语中出现了一大批梵语借词和译词,今天有许多都成了现代汉语的常用词,如“佛、塔、和尚、世界、因果”等;由于佛教文化在中国流传时间长,范围广,在汉语中便产生一批以佛事活动和佛教故事为内容的语词,它们反映了佛教的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如“衣钵、当头棒喝、顶礼膜拜、普渡众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并且,印度文化还使一些中国原有的事物,汉语中原有的词,带上他文化的内涵。如“狮”,在汉文化中它被用以象征人世的权势、富贵,也用于镇压和驱辟邪祟,但由于佛教文化的影响,它更增加了神圣、吉祥的意义。佛经喻佛为“狮”,《大智度论》:“佛为人中狮子。”又如“莲”,在汉文化中它被喻为花中君子,因“莲”、“廉”同音,常用来比喻为官清廉和品德高洁。由于佛教文化的影响,“莲”成为佛教的一种标志,汉语中佛国叫“莲界”,佛经叫“莲经”,佛座叫“莲台”,佛寺叫“莲宇”等。严格地说,在后两类汉语语词中所蕴含的文化并非汉民族的本文化,而是经过汉文化吸收的印度他文化。随着交通的日益方便和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往来的不断增加,这种用本民族语言反映他民族文化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例如,现在中国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绿色食品”的说法,这里的“绿色”所表示的意义就是国际通行的颜色标准意义——绿色表示安全和通行。其他如,“黄牌警告”已成为汉语词语,语素“黄”所包含的是外来文化的意义。

语言中文化的多样性更多表现在汉语所反映的本民族文化。汉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除了主流文化之外,还有历史、地域和群体等各种亚文化。下面我们来看看现代汉语所包含的汉民族文化的几个亚文化:

1、现代汉语中的汉民族古文化

语言由于它的社会交际职能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保持着相对

的稳定性,这样,有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而现在却已过时的古代文化便在汉语中沉积下来,使现在仍然通行的语言形式蕴含着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古代文化。例如,现代汉语常用词“时刻”,语素“刻”用来表现时间就涉及中国古代滴水计时的文化史实。当时的计时器叫“刻漏”,漏壶计时一昼夜共一百刻,“刻”就是在这种文化事实中具备了表现时间的职能的。现在早已不用刻漏计时了,但汉民族这种古代文化仍然在常用语词中保存下来。在汉语词汇中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现代汉语的语言使用也是这样,有许多传统的甚至是陈旧的观点在现代汉语使用中往往仍然发挥其支配影响的作用。

我们指出这种现象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语言中文化成分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不要以为现代汉语单纯地与汉民族现代主流文化相对应,而忽略了古代亚文化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2、现代汉语中的汉民族地域亚文化

汉民族分布面广,各地区除了汉民族的主流文化之外,还因文化渊源、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亚文化。各地区的亚文化和方言对汉民族现代汉语共同语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例如,以“吃豆腐”来比喻对妇女占便宜的非礼行为,这本来是江浙一带的说法,后来随着文学作品的流传和江浙人到其他地区工作学习的传播渐渐地被用到普通话里来;“炒鱿鱼”是广东、香港一带的说法,随着改革开放在全国各地推广,很快为各地区所使用。有趣的是,广东人由于方言的缘故把“牛仔裤”的“仔”读为 zǎi,这显然与普通话的读音不合,但现在各地甚至中央电视广播也使用广东人的读音。这种语言文化现象揭示了改革开放以后一种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社会心理。

中国有句成语叫“入乡随俗”,可见地域亚文化在交际中之不可忽视,同时也说明各地域亚文化的流通范围毕竟有一定限制。我

们提出注意现代汉语中的地域亚文化问题,不单单在于说明影响,还有提醒的目的,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要把一个区域的亚文化轻易地当作适用于各个地区的主流文化。

3、现代汉语中的汉民族社会群体亚文化

群体指一个社会的阶层或行业。由于出身、职业、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的差异,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其不同的亚文化。因而,不同群体使用语言的观念、习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尤其是某些特殊的行业,他们有自己的行话隐语,与主流语言文化差别更大。由于社会交际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使某些群体的亚文化有时也在通用语言中留下它们的痕迹。例如,走穴、下海、唱红等原是戏曲行业的用语;炒股、收盘、开市等原是证券行业的用语,但因为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这些词语很快成为全社会的通用语词,有的如“下海”,还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逐步形成了新的文化含义。

以上我们阐述了与汉语文化研究对象相关的几个问题。汉语文化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必须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我们从研究范围、角度和对象特点三个方面给这个特定对象作了一个初步的描写,目的在于明确概念,从而进一步了解汉语文化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和任务。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汉语文化研究

中国语言和文化都经过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其间,古人是如何看待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可供借鉴的材料,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今天的汉语文化研究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对古人的汉语文化研究情况作一

个简要的介绍。

一、先秦诸子对语言社会本质的研究

中国古代还没有人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理论研究,但是,先秦以来,古代学者在讨论政治、哲学问题时往往涉及语言的社会本质问题。他们对语言社会本质的看法是中国古代语言理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对语言社会性的重视是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显著特色,它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古人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认识,同时也表现了汉语研究的人文传统。古人对语言社会本质的理论探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与社会存在

发生在春秋之际的“名实之争”,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它反映了古代学者对于名称是怎样产生的、语言的意义与社会客观存在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等问题的关注。对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墨子有过很好的解释。他指出:“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墨子·经说上》)“名”是用来作称呼的,“实”是指所称呼的事物。一个是语言范围的问题,一个是社会存在的问题,而所谓“名实之争”,从语言角度来理解是对语言与社会存在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的争论。墨子接着指出:“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墨子·经说下》)他主张先有“实”,后有“名”。老子直接接触到“名”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他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他认为万物有了各种不同的名称,是由“道”这个“母”产生的。在《道德经》中,老子所描述的“道”是一个普遍的、非具体的、非个别的存在物,但他没有明确说明“道”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如果我们把老子“道”范畴的产生,看作人类抽象思想深化的一

种反映^①，那么老子在探讨“名”是怎样产生的问题时，考虑到“道”的作用就不无道理。荀子给春秋以来的这场“名实之争”作了总结，他比较圆满地解答了“名”是如何从“实”产生出来的，他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之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荀子的解答阐明了语言的社会本质，正确说明了词的意义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名实之争”和荀子的“名实说”对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中国古代的“小学”就一直以“名与实”作为研究的主线。

先秦学者还十分重视社会环境、历史文化传说对语言使用的制约和影响。这是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一个特点。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社会政治环境决定人们采用什么样的言语行为。荀子也指出语言活动是后天习惯决定的。他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吕氏春秋·善学》把荀子的话解释得更加具体：“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

（二）语言与政治伦理

中华文化重致用。古代学者在谈到语言或语言使用时，大都把它与政治伦理联系在一起，用他们认定的政治伦理标准来判别言语的好坏。儒家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突出，他们的看法对后代影响也最大。

孔子提出“正名说”，他把“正名”（纠正礼制上和名分上的用词不当）作为为政的充分条件来认识。《韩诗外传》卷五举了一个例

^①参见王德有《道旨论》，第33页，齐鲁书社1987年版。

子：

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

季孙是鲁国的大臣，因为他掌握了实权，他和他的属下不把鲁君当国君，所以“假马”说法反映了“礼”所规定的君臣关系受到破坏，孔子纠正了“假马”的说法，从而使国君与臣下的关系按礼制要求确定下来。他认为，只有按“礼”的要求来纠正各种礼制上和名分上的用词不当，才能谈得上为政安邦，因为用词实际上是政治伦理观念的体现。荀子进一步把言语的判别标准明确化，他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荀子·非相篇》）

春秋时期各家，尽管正名的概念、各自的政治立场都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把正名与政治联系起来，如名家公孙龙说：“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法家尸佼说：“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尸子·发蒙》）

语言与政治伦理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理论中有其突出的位置，这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使然，它对今天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语言与风俗

据说周秦时候，天子设立收集民歌民谣、调查方言的专门机构，并有采风的制度。《国语》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师箴，瞽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语上一）应劭《风俗通义·序》也提到周秦“尝以岁八月遣辎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的事实。进行民歌民谣和方言收集调查，从中可以了解各地的

风土民情和民间社会情况,给统治者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说:“此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早在两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认识到语言与风俗的关系,并且设立固定的制度、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进行这种语言文化的调查研究活动,这实在很简单。循轩木铎,体察民情,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往和歌颂的仁政,其影响是很深远的。

二、文献语言训诂中的汉语文化研究

中国自从有了汉字记载以后,每个朝代都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中华文化重传统,把如何阅读理解历史文献并用以指导当前言行看作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但是,语言是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后人阅读理解前人所记载的史册典籍往往因语言文字的障碍而产生种种困难,于是,“就开始有了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叫做训诂。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后来所说的文献语言学。”^①对古代文献的解释和说明包括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和文字等各个方面,其中对名物、典章制度,即对反映事物名称的语词和制度文化层次中的文化现象所进行的解释说明是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古代语文学者往往比较习惯以语文事实来揭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他们在对古文献语言的诠释过程中,有的探求事物得名的原因,有的探求表现文化现象的专名的语源。他们以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考求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制度和思想等文化事实,这说明中国古代语文学者已经懂得应用语言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来研究历史文化现象,这是十分可贵的。

^①陆宗达《训诂简论》第2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古代文献诠释中的汉语文化研究资料十分丰富,它们散见于各种训诂体式中,亟待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整理。下面略举数端:

(一)文献正文里的汉语文化

这里所说的文献,主要指四书五经以及先秦诸子的著作。文献正文里的汉语文化,并不是这些典籍用语言形式所传达的有关历史、政治、法律、文学、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内容,而是指文献保留的语言材料所蕴含的和体现的汉民族上古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1、文献正文里的名物释义

文献正文里的词语解释往往是从研究名实关系的需要出发而进行的。中国的古代学者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或反驳对方的论点,他们通过对反映事物名称的名词的解释,来确切地说明政治、文化等现象,这就在无意中使词义的探求与语言文化研究联系起来。例如:

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

②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

孟子在论述上古学校制度时,运用音训的方式说明了学校在上古三代不同命名的缘故及其作用,从而揭示了词语所包涵的文化底蕴。楚庄王在公元前597年运用字形分析的方式把“武”解释为实现“禁暴……丰财”的工具。为了证明自己看法,楚庄王还不厌其烦地引用周武王的诗章。这些充分说明了文化对词义理解的影响。

2、文献保留的上古词汇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语言系统中的词汇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